

文明的生态交互与自觉：彭树智先生的生态史观

张宏宇 马丽萍*

内容提要 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体现了一种“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交往是所有文明的历史进程的必经之路，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实现文明自觉、达成天人和谐的途径。“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环境史研究存在的问题：首先，避免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其次，为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角度，提供了一种理论架构，展现了更宏观的研究视角；最后，为环境史增添了新的叙事模式。此外，“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为中东环境史揭示了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指出了“文明交往的单位、方式以及内容”的研究主题，并指明了“全球史”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 生态史观 环境史

彭树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内中东史研究的奠基人。在研究中东史的数十载里，彭树智先生著述等身，著有《阿拉伯国家史》、《二十世纪中东史》、《中东国家通史》（13卷本）等著作30余部、论文百余篇，为国内相对薄弱的中东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彭树智先生以自身对中东史的研究为基础，凭借敏锐的史学嗅觉和思想深度，提炼出了“文明交往论”。该理论为国内的中东史学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内学界充分讨论并肯定了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的史学意义。陈天社认为“文明交往论”为学界提供了新视角，为中东研究提供了新观

* 张宏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马丽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点。^① 巨永明认为“文明交往论”可以作为分析全球化的理论框架，是关于全球化研究的一种理论创新。^② 蒋真则对“文明交往论”中的“知物之明”、“知人之明”以及“自知之明”进行了阐释，认为三者相互作用促成了人类文明走向自觉。^③ 张倩红先后撰写了三篇文章，翔实地阐明了“文明交往论”在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④ 不仅如此，“文明交往论”对于指导我国当前多个学科的具体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例如，蒲瑶借助“文明交往论”分析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的原因、载体和方式。^⑤ 罗艺峰在《文明交往论与中国音乐学》一文中提出，在“文明交往论”的指导下，只有沟通与融汇，中国音乐学才会有未来。^⑥ 王泰则认为“文明交往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国内外交哲学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⑦ 冯广宜认为“文明交往论”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⑧ 李苑和牟珊珊先后讨论了“文明交往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认为“文明交往论”有助于深化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史观运用。^⑨

上述研究聚焦于历史学、音乐学、国际政治以及中学教育等各个方向，足见“文明交往论”在多学科领域中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之根、之源”，^⑩ “要全面了解人类

-
- ① 陈天社：《新探索、新视角、新观点——读〈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 ② 巨永明：《文明交往：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 ③ 蒋真：《从文明自觉的“三知之明”探析彭树智先生的文明观》，《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 ④ 张倩红：《从文明交往关注世界历史——〈文明交往论〉读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张倩红：《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读〈松濂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张倩红、刘洪洁：《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 ⑤ 蒲瑶、彭树智：《从文明交往论看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人文杂志》2006年第5期。
 - ⑥ 罗艺峰：《文明交往论与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2009年第2期。
 - ⑦ 王泰：《“文明交往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构建刍议》，《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 ⑧ 冯广宜：《文明交往论与“一带一路”建设》，《科学·经济·社会》2016年第3期。
 - ⑨ 李苑：《文明交往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8；牟珊珊：《文明交往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9。
 - ⑩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72页。

文明交往史,生态环境问题不可或缺,生态环境的历史也不可或缺”。^① 彭树智先生十分看重生态因素在“文明交往论”中的重要价值,并在系列论著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可惜尚未被国内学界所重视。因此,笔者试图分析、归纳彭树智先生的生态史观,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和中东环境史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浅见。

一 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

谈及生态史观,20世纪中叶,由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所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在国内外学界声名远播。梅棹忠夫将生态与文明结合起来,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东西方世界文明的演化进程。^② 诚然,“文明的生态史观”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开启了用生态学视角进行历史研究的进程。但是,他所宣扬的日本文明的生态和地理位置的卓越性,以及由此将日本与西方并称“第一世界”的说法,透露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民族主义。

与“文明的生态史观”相比,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中的生态史观同样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但与之不同的是,交往才是“文明交往论”的核心。在彭树智先生看来,“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主题有三,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的自我身心”。^③ 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关系”。^④ 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交往而形成和变化的。无论在起源阶段、进化阶段,还是处于现在,人类始终都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类社会要实现发展,必然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人与自然建立了交往关系,而这种交往关系促进了“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利用、适应、改造和保护自然,从而实现交往的文明化”。^⑤ 彭树智先生所提出的“交往的文明化”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三个阶段,即敬畏自然、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天人合一。人

①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75页。

②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王子今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③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4页。

④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39页。

⑤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40页。

类社会在敬畏中熟悉自然、亲近自然，在文明进程中奴役自然、割裂自然，最终，伴随着自然的“报复”，人类放下了征服者的身份，回归自然、保护自然。^①

人与自然交往的三个阶段直接反映了二者的非平等性关系。这种非平等性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人类不能脱离自然而生。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类必须依赖自然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破坏自然，也是毁灭人类自身。其次，人类必须受自然规律支配。人类利用、开发自然，必须深刻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就会遭受到自然的惩罚。最后，自然在交往中呈现一种被动性。在自然与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人类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而自然“不需要通过与人的交往而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②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与惩罚”实际上是自然对二者交往的回馈，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和自由选择。^③

彭树智先生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彭树智先生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打开闭塞状态、走向世界的交往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将交往扩展到周围地区乃至各时代力所能及的心目中的世界”。^④因此，“人类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⑤在人类文明交往的系统内部共有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它们分别代表了物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态环境。^⑥在文明交往的系统中，个体与社会、国家与地区之间展开了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制度交往和生态交往。通过四大文明交往的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人类也从孤立、封闭的地区社会生态环境走向了普遍联系的、全球化世界，实现了“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⑦具体而言，文明交往在物质层面“提高了人们富裕的文明生活的水平”；在精神层面“升

①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41~242页。

②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52页。

③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42、252页。

④ 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⑤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66页。

⑥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5页。

⑦ 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华了人们的思想文明境界”；在制度层面“推动着人民社会文明规范的完善”；在生态层面“增进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统一，保证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①

在整个文明交往的系统中，生态文明发挥着基石的作用。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如果生态文明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其他三要素也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②一方面，生态文明是文明交往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交往的缺失，会导致历史研究中遗漏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弱化二者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而忽视生态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制约作用。按照彭树智先生的观点，“历史是人类在文明交往中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深厚的自然—社会结构”。^③生态文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在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交往过程中互相融合，协同演化，走向文明。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实现自觉的途径。如果说“文明交往论”反映的是历史发展的横向状态，是历史发展的纵向动力，那么文明自觉则是“文明交往论”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因此，彭树智先生将“文明交往论”归结为“文明自觉论”。

“文明自觉论”，“即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变，在趋向上日益摆脱野蛮而逐步文明化，在发展上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际化、族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由对立、对抗走向合作与对话”。^④“文明自觉论”所揭示的正是人类历史由蒙昧走向科学、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而欲实现文明自觉的目标，学会尊重自然规律是唯一途径。^⑤无论是从野蛮到文明，还是从感性到理性，人类文明的自觉过程，始于“知物之明”。只有在人类与物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形成文明自觉意识。^⑥彭树智先生于此提出人类社会增强自觉意识的三个维度，即科学理性维度的觉悟，有利于人类社会科学、

①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6~7页。

②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41页。

③ 彭树智等：《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66~67页。

⑤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39页。

⑥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495页。

正确地认识自然；伦理理性维度的觉悟，揭示了人类应承担的生态责任；哲学理性维度的觉悟，认清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关系。^①可以说，三个维度既是人类社会中生态文明交往的结果，也是文明自觉的推动力。进一步而言，人类文明自觉的根源在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对工业文明反思的自觉，也是关乎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自觉”。^②生态文明的这种根源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明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而且还表现在以生态规律为准则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即以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为基础的文明交往的动态平衡。甚至可以说，文明自觉从根本上是人类遵循生态准则而进行的文明交往活动的文明终极形态。换言之，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是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的劳动创造，是人类认识、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谋福祉”。^③文明自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历史行为的反思，以及不断加深对自然变化的认知。

综上，笔者认为，在彭树智先生的论述中体现了一种“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首先，文明交往是一个历史进程，表现于不同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层面，是所有文明的必经之路。一方面，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的交往互动是各文明存在的普遍规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既依托生态资源发展，又受制于自然生态规律。在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地改造自然，人类相应地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人类社会也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完成了统一，并成为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和交往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交往互动又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主题。尽管不同文明的目标相同，但是在面对不同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时，文明之间所选择的道路必然不同。换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交往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不同的历史运动轨迹，而这并不意味着文明之间的优与劣。文明交往恰恰说明了不同的人类社会在走向文明化的过程中殊途同归，文明的多元化也为人类走向全球化绘制了缤纷绚丽的历史图景。

①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56~257页。
②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72页。
③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78页。

其次,文明交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彼此制约且共同发展的矛盾的统一体。人类社会与自然的非平等性关系表明了二者“主体—客体—主体”的辩证关系。在文明交往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交往行为的发出者,也是自然反馈的接受方;自然的被动性则决定了自然的被改造和利用的过程是受制于人类的过程,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文明交往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演变过程。这种作用不仅发生在文明体内部,而且还发生于不同文明之间。在内外合力施加的作用下,人类社会与自然彼此融合、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塑造了文明的框架和结构,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最后,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自觉的途径,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协同演化的共同体。自然生态贯穿着人类的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断地改造自然,推进了自然的社会化。但是,改造自然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要在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下求生存、促发展;自然对人类的反馈也导致了个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认知逐渐觉醒,人类在改造自身和社会的同时,将自然生态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促进了社会的生态化。最终,在文明交往之下,人与自然的交往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利用、索取到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人类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良性互动,在推动个人和社会文明化、实现文明自觉的同时,也促成了天人和谐。

二 “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意义

国内历史学界很早就已经注意到生态环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早在1950年,雷海宗先生所作《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一文,揭示了砍伐森林、开垦农田所造成的气候变化以及后续的农业变迁。^①在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以及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下,环境史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兴起,并迅速在全球各国的历史研究中掀起了热潮。^②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侯文蕙、包茂红等学者的努力下,国内环境史研究快速发展。目前,国内的环境史领域里,已经建立了十余家环境史研究平台,并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第226~248页。

② 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5页。

在王利华、梅雪芹等中坚学者的引领下，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环境史研究人员。在他们的努力下，所著成果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中国环境通史》（4卷本）这样的优秀巨著。

然而，在环境史学方兴未艾之际，其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①首先，研究中存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割裂的情况。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是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但在当前的研究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立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二者难以相互作用、互相渗透。其次，环境史研究存在比较严重的碎片化问题。研究中局限于具体问题研究，缺乏学科理论支撑和体系架构，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情况加剧。最后，囿于成见与批评，研究在环境史叙事中畏缩不前。自环境史发展至今，“环境决定论”和“环境衰败论”甚嚣尘上，成为环境史研究人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②学界对二者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环境史叙事的保守和偏离，更进一步则会导致学者对人与自然复杂互动关系的认识不清。

笔者认为，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所体现的生态史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首先，“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避免了自然与社会割裂情况的产生。彭树智先生开宗明义地提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产生人类文化的各种形态。人类文明交往于两个环境之中”。^③展开来说，文明内外的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更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面貌”。^④“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立足于文明体系，决定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的交往互动是其研究的主体内容。在“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的视角下，自然生态应当被视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结构性的因果要素，自然生态也不是人类社会演变的背景，而是应当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

彭树智先生以自然灾害为例，阐明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互动交往关系。通常情况下，自然灾害或被视为自然史的一部分，或成为灾害

-
- ① 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 ② 刘向阳：《取向转型：从“衰败论叙事”到“地方性知识”的环境史》，《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4日；赵九洲：《衰败论：中国环境史的误判及其评析》，《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2期。
 - ③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86页。
 - ④ 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史研究的注脚。在彭树智先生看来,“自然灾害不是纯粹自然性的事件,它是人与自然交往的重要方面”。在文明交往的过程中,自然灾害“是发生在特定地区、特定时间的影响特定人群利益的突发性文明交往事件,……是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灾害被置放到了文明交往的视域下,文明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成了文明内部,即经济情况、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共同决定的应对自然灾害的途径。而人类文明恰恰是“在顺应自然环境中形成和在不断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发展的”。^①在这里,通过“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将自然灾害的爆发、变化及消失,与人类的社会活动对应起来。二者的统一,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体现,也表明了自然灾害对人类发展的推动。

其次,“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提供了一种理论架构,展现了更宏观的研究视角。在当前的环境史研究中,人类社会被看作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的历史也被视为地球生态变迁的一部分。在环境史学者看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是彼此影响、互相作用的统一整体。环境史研究既要考察历史上人类作用于生态环境引发的种种变迁,也要探讨自然生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美国环境史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研究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在其代表作《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与《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中,克罗斯比使用全球生态系统的概念理解欧洲的扩张,即欧洲殖民者的扩张行为实际上是人类社会与动植物、病菌等生物相互配合的一致行动,是欧洲生态系统的整体迁徙,而这些才是欧洲殖民成功的主要原因。^②彭树智先生的许多观点与环境史学界的看法相同。正如上文所说,“文明交往论”所体现的生态史观也同样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认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互动论。但是,彭树智先生进一步指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体现。

在“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中,文明交往不仅包含“人类和自然的互

①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96~297页。

② [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民、许学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动系统”，还是“一个人与人……的互动系统”。^① 具体来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因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社会是人类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同时，人类同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的。此外，人类对自然关系的评价，也是以人的价值观为尺度的。因此，把人类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② 诚然，克罗斯比通过欧洲生态系统与其他地区生态系统的交往互动解释了殖民的过程和结果。但是，克罗斯比忽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关系中自然存在的被动性。在生态系统中，包括动植物、细菌等在内的生物，需要存活于群落生境之中，即使如大雁、鲸鱼等迁徙性生物，也有设定的迁徙路线。换言之，非人类生物的物种的生存状态比较稳定、生存空间相对固定。除非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或者重大的地理环境变迁，否则它们很难做出相应改变，而人类的社会活动正是其他生物交往的动力来源。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彭树智先生没有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共置于生态系统内考察，而是站在更宏观的高度，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将人类社会置身于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更大的文明系统中去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化、文明化和自觉化过程，进而阐明人类社会的行为逻辑，探索人类历史的总体演进。在具体研究中，彭树智先生将动物驯养和犁地种田视作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彼此内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也是生物、生态环境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交往的体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反映了两种文明在与生态环境交融一体化之后的交往结果，体现了人类早期文明发展。^③ 由此可见，“文明交往论”可以作为“全面审视人类历史总进程的适宜理论”，^④ 其所体现的生态史观具备了环境史研究的优势，以文明交往为研究主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最后，“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为环境史增添了新的叙事模式。环境史兴起之际，全球环境问题凸显，人类环保意识觉醒。为解决现实问题、引

①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20~23页。

② 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62页；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16~17页。

④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252页。

发学界与社会重视,环境史研究形成了“环境衰败论”的叙事模式。但是,“‘环境衰败论’蕴含了一个逻辑假设——无人干扰的原生态自然是美好的,在历史演进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恶化。……承接逻辑假设,在历史观上表现为直线型的倒退历史观,价值评判上往往将人类妖魔化、庸俗化,而将自然神圣化和绝对化”。^①而“环境决定论”产生的时间更加久远。自孟德斯鸠至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环境决定论”曾在数百年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之后,“环境决定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许多学者在讨论环境问题时有失公允。

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是一种新的叙事模式。首先,在这种叙事模式下,文明交往是研究的主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只是文明交往的四个层面。其中,自然生态只是文明交往过程中“主体—客体—主体”变换的一个重要因子,无法在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的关系中起到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文明交往论”从根本上杜绝了“环境决定论”的可能性。其次,在人类文明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环境衰败论”所体现的环境问题只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交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学界对“环境衰败论”过度地批判极有可能不利于对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立足于史实,发掘人类与生态关系背后的思想、制度、器物上的动因,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驳斥,也是对环境中心主义的修正。最后,“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提供了一种从蒙昧到科学,从否定到肯定,从敬畏、漠视到欣赏的文明自觉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不仅符合唯物史观,而且体现了历史叙述的多元性。此处笔者举两例予以说明。其一,“文明交往论”所提供的叙事模式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变动途径。彭树智先生从“敬畏感”切入,揭示不同时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古代的“敬畏感”以“畏”为主,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实践能力和对自然的熟悉程度;现代的“敬畏感”以“敬”为主,敬重自然规律,是人类社会的自觉。^②其二,“文明交往论”所提供的叙事模式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良性互动的一面。彭树智先生从“审美角度”看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审美是人的自我身心与社会和自然的交往,

① 刘向阳、魏亚茹:《环境史叙事范型演变路径的追溯与反思》,《史林》2017年第2期。

②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43~244页。

审美自然是“诗意自然，是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观”。占有自然、消费自然和破坏自然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交往的不自觉体现，也是对自然诗意美的损坏。通过文明交往，生态文明自觉引导人类学会欣赏自然的诗意美，认识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哲理”。^①

三 “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对我国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启示

环境史发展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与其他地区相比，中东是环境史学界相对忽视的区域。正如中东环境史学家艾伦·米哈伊尔（Alan Mikhail）所说，中东地区是“全球环境故事中的一个巨大漏洞”。^② 在过去十多年里，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变。国外的中东环境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中东区域的环境通史，并且在以气候、疾病、动物、水资源等为主题的领域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成果。^③ 尽管国内尚未展开中东环境史研究，但是彭树智先生的观点无疑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

首先，“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揭示了中东环境史的研究意义。具体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填补了国内世界环境史研究的空白。历史交往论可以

- ①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68~269页。
- ② Alan Mikhail, “Introduction: Middle Ea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Fallow Between Two Fields,” in Alan Mikhail, ed., *Water on S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
- ③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已初具规模，笔者在此处仅列举部分代表性成果，权作参考。关于中东环境史的区域国别研究：Alan Mikhail, *Nature and Empire in Ottoman Egyp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ennifer L. Derr, *The Lived Nile: Environment, Disease, and Material Colonial Economy in Egyp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关于气候主题的研究：Sam White, *The Climate of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lan Mikhail, “Climate and the Chronology of Iranian History,” *Iranian Studies*, No. 6, 2016, pp. 963-972。关于动物主题的研究：Suraiya Faruqi, ed., *Animals and People in the Ottoman Empire*, Istanbul: Eren, 2010; Alan Mikhail, “Unleashing the Beast: Animals, Energy, and the Economy of Labor in Ottoman Egyp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8, No. 2, 2013, pp. 317-348。关于疾病主题的研究：Sam White, “Rethinking Disease in Ottoman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2, No. 4, 2010, pp. 549-567。关于水资源主题的研究：Alan Mikhail, “An Irrigated Empire: The View from Ottoman Fayy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010, Vol. 42, No. 4, pp. 569-590; Alan Mikhail, ed., *Water on Sand: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为一种角度,从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的交往考察历史的发展和方向。由此展开,自古代起,中东地区就是“人类文明生产和聚散的中心”。在中东地区,不仅存在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兰文明、波斯伊朗-伊斯兰文明、阿富汗-伊斯兰文明、犹太-希伯来文明”在内的众多文明单位,^①而且中东地区位于亚、非、欧交界之处,是连接其他文明的关键节点。换言之,中东之所以成为中东,是中东地区内部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交往、融合、发展的结果。中东地区汇聚了文明内外的商贸流通、人口流动、动物迁徙、疾病传染、宗教传播等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各类行为。通过这些行为连接的地区,构成了一个超越中东地区的大循环、一个以联系和运动为特征的交往世界。并且,环境史研究所暗含的“交往”本质也需要中东地区。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缺失,既不符合全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客观实际,也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观念,割裂了历史空间的连续性。可以说,开展中东环境史研究对环境史学科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第二,开辟了国内中东史研究的新领域。“文明交往论”中所提到的四个层面是国内中东史研究的重要选题。目前,国内中东史研究聚焦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于“国家建构”“民族部落”“外交”“宗教”“能源”等主题的论著丰硕,但在生态文明方面非常欠缺。正如上文所述,生态文明不仅是“文明交往论”中的主要因素,而且其存在和发展不能孤立于其他文明。一方面,生态文明是中东地区的根本属性,对中东环境史的研究有助于发掘中东历史上各文明之间的共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紧密结合、互相影响,中东环境史的研究为现有其他方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例如,国外环境史学者认为中东各国通过对自然资源和公共卫生的控制,促进了现代化进程。^②

第三,对国内的国际政治研究和“一带一路”倡议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中东地区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也是人类开发、改造环境最持久的地区之一。时至今日,中东地区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从古至今,中东

①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900页。

② Sam White, “Middle Ea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Ideas from an Emerging Field,”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 8, No. 2, 2011, p. 1.

地区始终存在土地退化问题。80%以上的中东地区是沙漠或半沙漠地区，干旱和降雨稀少是常态。旱地耕种导致土壤变得更加干燥，大部分田地很快就被废弃，当地植被严重退化。尽管存在严重的土壤问题，但大多数中东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在旱地上进行谷物种植，为其人口提供基本粮食保障。^① 耕种面积的增加随即导致灌溉量的增加，引起土壤盐碱化和水资源紧张，进一步引发中东地区的国际争端。^② 除此之外，诸如有关土壤和水资源的重金属和农药污染、血吸虫疾病传播、河道退化、工业铅污染、废水废料海洋倾倒等问题成为当代中东各国面临的重要难题。^③ 梳理这些环境问题的发展过程，探究背后的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交往关系，不仅有助于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深入研究，而且有利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

其次，“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指出了文明交往是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根据文明交往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文明交往的单位。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中东是由沙漠构成的地区。实际上，中东地区地域辽阔，具备极其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沙漠、草原、河谷、平原、海湾等各类生态系统共同构筑了中东地区的生态混合体，也在各自的生境中孕育了不同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④ 以不同生态环境为基础的文明之间的交往不仅是文明交往的基本单位，也是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主要主题之一。通过研究中东地区内部不同文明之间以及与外部文明之间的生态交往，可以对中东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关系产生一个较为全新的认识。

二是文明交往的方式。中东地区是亚洲、非洲、欧洲的枢纽，不仅在陆地上连通了各大洲文明，而且其海上交通加大了交往的密度。在中东地区的陆、海两类交通路线中，人力、动物力、风力、蒸汽动力等多种交往

-
- ①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2,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er, 2004, pp. 841-842.
- ② Sharif S. Elmusa, *Water Conflict: Economics, Politics, Law and the Palestinian-Israeli Water Resource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Palestinian Studies, 1997; Mostafa Dolatrar, Tim S. Gray, *Wat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A Context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2000.
- ③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2,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er, 2004, pp. 843-844.
- ④ Edmund Burke III,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ern Environment, 3000 B. C. E. -2000 C. E.," in E. Burke III and K.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1500-20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112-113.

方式相继完善,加快了交往的速度,拓宽了交往的范围。以骆驼为例,自驯化以来,骆驼不仅仅是商贸工具,更是中东地区以及外部文明的社会和生态的串联者。更进一步地说,文明交往的方式推动了生态文明的交往,即生态交换。如上文所述,自然生态的被动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的能动影响。因此,在人类文明的交往下,原有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同交往方式四处迁徙。在侵入陌生的生态系统后,实现了生态演替,也促进了该文明地区的发展。

三是文明交往的内容。文明交往的内容包括思想文化、技术知识、各类物质以及非人类生物等。在环境史视域下,文明交往的内容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了历史的发展。其一,文明交往中的生态因素改变了互动地区,例如,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的农业革命。在与南亚和东南亚的贸易中,中东地区引进了棉花、甘蔗、高粱、硬质小麦和亚洲水稻等作物,推动了农业技术和制度革新,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为伊斯兰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①其二,文明交往的非生态因素改变了互动地区的生态文明。例如,伊斯兰教的传播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伊斯兰教“圣训”向穆斯林传递了保护环境的纲领性指导意见:(一)鼓励种植、保护植被;(二)善待驯养动物;(三)避免水、空气、土壤污染,保护生存环境,保持公共场所卫生;(四)禁止蓄意腐败和浪费。^②这些教旨显然对相对脆弱的中东地区的生态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促使中东地区的生态状况在历经千年的经济活动后依然可以支撑现代化经济模式。

最后,“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为中东环境史指明了研究视角。当前中东史研究已经被“民族和国家”的研究框架所主导,^③导致对中东不同国家的研究陷入了同质化的牢笼。该研究框架一方面割裂了中东地区内部的整体性,不利于挖掘中东地区各文明之间存在的普遍交往关系;另一方面切

-
- ① A. Watson, "The Arab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Diffusion, 700-11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pp. 8-35.
- ②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2,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er, 2004, pp. 710-713.
- ③ 黄民兴:《试析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和特征》,《西亚非洲》2008年第4期;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张燕军:《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冀开运、母仕洪:《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及启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4期。

断了中东地区与全世界的联系，有悖于中东地区的交往属性。按照“文明交往的生态史观”，全球史应该是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主要且重要的研究视角。通过将中东地区置于全球语境下，中东环境史的落脚点不应该局限于国家范畴，其应该被视作超越国家政治边界的人与自然的交往史。在全球史视野下，可以研究中东文明与外部文明之间形成的交往网络，阐明二者之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在全球史视野下，也可以探究“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即使所研究区域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地域范围之内，也应该从全球史视角来考察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之间的交往。通过将四个方面之间的交往投射于“大世界”的历史过程，全球史视角重塑了中东地区“小地方”的历史运动轨迹。

结 语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暴发，这场殃及全球的疫情持续了两年，波及人口约10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58.8%。百年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所影响的范围和人口更胜于前。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似乎总是忽视生态因素造成的影响。直到危机爆发的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渺小。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蕴含的生态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互相作用推动了历史进程。生态危机之于人类也不尽都是危害。正如黑死病之后的欧洲开启了文艺复兴大门，新冠疫情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者。只有在生态危机中成长，反思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人类才能形成从个体到社会的自觉意识。立足于文明交往，搭建一个开放、合作的全球化平台，共克时艰，人类文明才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文明自觉。

[责任编辑：龙沛]